

围绕经济增速、外资流向与资本市场,听听肖钢委员怎么说

本报记者 崔吕萍

步入“十四五”的第一个年头,有人说,有些外资正在从中国撤离,这是真是假?还有人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将承受打破刚性兑付之后的信用考验,这一考验是难是易?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听听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怎么说。

即使经济增长8.1%以上,也不意味重回高增长阶段

记者:世界银行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4%,中国经济有望继续扩张7.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经济2021年将增长8.1%。您如何看待这些预测?

肖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我理解GDP增速在2021年和未来一段时期都将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这对于落实我国远景规划、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做好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环保、区域协调等宏观经济治理具有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现在一些国内外机构都在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且给予了积极乐观的评价。这些预测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是一次严重的外部冲击,使得当年经济特别是上半年经济大大偏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随着我国疫情得到有效防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率先复苏,因此今年经济有望向正常状态回归,并可能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

应当看到,即使今年我国经济增长在8.1%以上(第一季度增长可能会达到两位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重回高增长阶段。如果把2020年和2021年累计起来看,共增长了11%多,年均增长5.5%以上,恢复到了常态,与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趋势是一致的。

聚焦“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央企治理,别把外部董事当“外人”!

葛红林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对加强董事会建设、发挥外部董事作用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新要求,我作为一名外部董事,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2019年10月,我不再担任中铝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2020年3月,我出任航天科技集团和航空工业集团外部董事及召集人。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就做好外部董事的工作,我谈三个方面认识体会。

第一,外部董事是央企董事会组成的充要条件。

1995年,作为我国最大的特殊钢铁企业的上钢五厂要进行公司制改革,由工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上安排我出任董事长。一位退居二线的老领导就董事会组成,给我提出设立一位职工董事和一位外部董事的意见。这在当时是很前卫的创新,设立职工董事的出发点是依靠职工办企业,由全厂职代会推荐来自生产一线的职工担任董事。而设立一位外部董事的出发点就有些和上级博弈的“小九九”。因为当时的上级普遍管得紧、管得多、不愿放权,方式是“婆婆+老板”,设立外部董事,是希望有个减少干预的挡箭牌。于是,我们聘请了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科院院士、上海冶金所所长作为公司的外部董事。果然效果不错,也避免了当时较为盛行的“让好企业摊派个差企业”的拉郎配行为。

1998年,通过宝钢吸收整合上海钢铁企业和梅山钢铁公司,组建了上海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11人的董事会,宝钢、上钢和梅钢分别派出6人、3人和1人,董事长外派,由退居二线的原冶金部常务副部长出任,但是没有设立职工董事和外部董事。

2000年,上海宝钢集团将钢铁的核心资产上市,新成立的宝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外籍人员担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在两家公司董事会中,我都担任内部董事,亲历了两种董事会的不同决策方式和风格。在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是“一枝独秀”?主要原因是我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经济率先复苏,同时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创新发展动能的巨大吸引力。

有人说外资在撤离中国,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记者:2020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创历史新高,并实现了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认为外资在撤离?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肖钢:我认为,在利用外资方面,“东强西弱”是趋势。

2020年,中国吸引外资跃居全球第一,与西方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大幅下降形成了鲜明反差。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报告,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8590亿美元,同比下降42%,其中西方发达国家下降了69%,创下过去25年以来的最低值,而中国逆势增长

4%,高达1630亿美元。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是“一枝独秀”?主要原因是我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经济率先复苏,同时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创新发展动能的巨大吸引力。

至于有人说外资在撤离中国,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听一听外资企业的声音,就更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有些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受疫情影响零部件一时供应不上,当地政府部门迅速行动,能够在24小时内帮助解决采购配送;一些外资企业在华扩大生产规模遇到招工难问题,地方上也能采取灵活方式帮助企业补充足够的熟练工人。针对部分外商企业因疫情导致在华追加投资暂时无法到位时,我国商业银行及时为外资企业提供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解决它们的“燃眉之急”。这些都让外资企业家备受感动,凸显了我国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力与良好的营商

全部由内部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决策往往是高度一致,最终往往统一到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上。而有外籍独立董事参加的董事会,有时决策并不顺利。往往因为外籍董事持有不同意见,有的议案在董事会上就未能通过,也有议案还没有上会就被搁置了。

在钢铁行业的董事工作经历,让我深切感受到,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作用是不一样的,外部董事是现代企业董事会组成的充要条件。所谓“充要条件”就是指董事会中必须有外部董事,没有外部董事的董事会是不健全的。外部董事在防范风险上具有独特作用,在较大程度上,能够起到制衡盲目决策和“一把手说了算”的作用。另一方面,外部董事要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更加关注风险防范,董事会要强化与外部董事的沟通,确保他们全面了解掌握决策背景、流程、要点等有关情况。

第二,作为董事长,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地发挥外部董事的作用。

2001年10月到2014年10月,我从央企转到政府工作。在我担任成都市长期间,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对央企的招商引资。我接待过众多央企的代表团,每当看到代表团成员中有外部董事,或者是监事会主席时,给我的提示是“对方要下定决心投资了”,于是要求相关部门和区市县委领导做好接待和介绍,千万不能冷落他们。

2014年10月到2019年10月,我从政府又回到央企,担任中铝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正是与外部董事的长期交往以及对外部董事独特作用的认知,我从内心十分看重尊重组织上选的外部董事,从来不会将外部董事当作“外人”来看待。

作为央企董事长,我在与外部董事“共事”过程中,积极适应董事长与外部董事的新关系和新要求,努力发挥好外部董事的应有作用。

首先,将发挥外部董事的作用作为董事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董事长与

外部董事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作、互相制衡的共事关系。要摆正二者的定位,决不能将董事长的意见强加于外部董事,对意见不一的,应当是去沟通而不是去说服,在沟通中求同存异,求得最佳方案。

其次,积极看待外部董事对提案的严格把关。党组书记、董事长会遇到经过党组会研究的议案被外部董事否决的情况,即使认为“真理”不在外部董事手中,也决不能“上火报怨”,更不能以党组已经做了前置研究讨论,去施加压力,强行说服。而应当针对外部董事提出的具体意见,冷静思考,组织力量,逐一分析、逐一考量、逐一沟通。举不胜举的案例告诉我们,每一次的不同意见都会促进议案的更新完善提升,都会发现自身工作的缺失不足之处。

再次,应毫不保留地为外部董事提供公司的真实情况,包括有些摆不上桌面的“难言之隐”。做到心胸坦荡、开诚布公,绝对不回避矛盾、绝不遮掩短板、绝不敷衍问题、绝不弄虚作假。对外部董事的调研,既要安排去好的企业,也要安排去困难企业,对拟决策的投资和资产重组项目,尽可能地做到外部董事调研后再上会,提高决策的精准度。

另外,要完善强化董事会办公室的支撑功能作用。除了要求董事会办公室在做好对外部董事的日常服务工作之外,更要做好提交给外部董事的议案及文件的质量把关,对拟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董事会的议案,一定要事先向外部董事说明原因,做好沟通,求得理解。同时,认真办理外部董事的意见建议。针对在董事会和调研过程中的认知,外部董事提出的意见建议,董事长要认真对待,逐条阅研,分类处理,及时反馈。有的要求部门组织研究、细化落实、精准实施,有的要安排经研层研究方案、督促检查、保障落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实践证明,董事长只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地尊重外部董事,才能赢得外部董事的信任,让外部董事敢于讲实话、讲真话。

环境。事实再次证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可能与中国脱钩。

当然,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各国从安全角度考虑,超越劳动分工、成本收益范畴,作出政治决定与政策调整,但这并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而更多地呈现出自主化、多元化、伙伴化的特点,在演变的过程中,我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打造出新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打破刚兑、允许违约,并不等于可以不守信

记者:对于2021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规范,您有哪些期待?

肖钢: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经过30年栉风沐雨,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特别是近年来加大了改革开放,围绕股票发行注册制、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和新三板改革,以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一系列基础制度进一步完善,大大提升了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效率。在新的一年里,期待资本市场各项改革开放举措进一步配套落地,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市场活力与韧性进一步增强。

规范发展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是解决企业融资困难、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重要渠道。企业发债可能发生违约,这是市场成熟的标志,有利于完善信用风险定价机制,加快市场优胜劣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市场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注意处理好打破刚性兑付与维护信用的关系,两者是有机统一的。打破刚兑、允许违约,并不等于可以不守信,更不是放任违约、甚至纵容不守信。发债人应当珍视信用,坚守诚信,不逃废债。只有做到既打破刚兑,又维护信用,坚决打击逃废债行为,才能增强投资者信心,保障市场稳定、健康运行。

强化对互联网行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

——访全国政协常委马正其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了过去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繁重艰巨。”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总局副局长马正其这样表示。

今年,面对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对此,马正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供给侧的同时也强调需求侧,并在此基础上部署了重点任务。其中有3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大家关注。

一是对扩大内需进行了具体制度安排。“会议不仅强调了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还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的制度设计,提出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相关部门适应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品牌消费的重要趋势,积极回应广大消费者对消费品质消费服务的更好要求,着力解决影响群众消费信心的突出问题,

为扩大内需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马正其这样表示。

二是对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进行了再次强调。建设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深化“证照分离”改革,便利市场主体和产品准入。同时,要强化执法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链条保护,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三是对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进行了明确部署。“中央近来多次提及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强调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表明了加强规制,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决心。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加速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健全数字规则,强化对互联网行业中各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推动互联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马正其表示。

2021年中国引擎将引领全球增长

本报记者 李元丽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20年我国GDP达到14.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预期达17%,居世界第二。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泰君安国际董事会主席阎峰表示,2020年四季度,欧美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弹下前景黯淡。从中国情况看,疫情控制较为有力,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配合背景下,经济复苏步伐加快。资本市场方面,尽管特朗普政府在下台前针对中国企业实施了一系列打压,但国际资金流入香港和内地股市趋势加强,带动了两地优质蓝筹股估值显著、持续和快速攀升。

展望2021,阎峰表示,从国际看,欧美经济仍受到疫情羁绊,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仍面临如何尽快走出疫情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等难关和挑战,低利率、低增长很可能成为欧美新常态,甚至有出现滞胀的可能性,美元存在贬值风险。从欧美各国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引发的零利率和财政政策持续宽松引发的巨额财政赤字两个方面来看,欧美资本市场繁荣和经济增长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除去流动性收缩的风险以外,企业债务水平激增也可能引发一轮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引发股市大幅调整。从国内看,2021是中国构建“双循环”

2021年扩大消费是稳增长关键

本报记者 李元丽

“2020年消费增速前低后高,逐步企稳。从银联网络交易的数据来看,2020年1-4月份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消费规模下滑较严重,但随着疫情逐步被控制、复工复产有序展开,全国消费规模迅速提升,至2020年6月基本接近上年同期水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联原董事长葛华勇表示。在葛华勇看来,从消费结构来说,综合零售行业整体复苏情况较好,率先在6月恢复至疫情前的消费水平,全年交易金额在全行业中占比提升0.8%。单笔消费强度有所增加,其中百货商品类较2019年增长25%左右。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的消费金额在9月后逐步回落,反映出疫情逐步稳定、居民日常生活进入常态化。餐饮行业2020年上半年单笔消费强度较2019年增长25%,下半年消费强度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充分反映了食品类物价逐步平稳。体育用品行业单笔消费强度较2019年同比增长10%左右,全年交易金额在全行业中占比提升0.5%,说明受疫情影响人们更多地选择自购体育用品居家锻炼。汽车、休闲娱乐、住宿等行业仍未恢复至疫情前交易规模,交易金额仅恢复至疫情前的85%左右。

为扩大内需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马正其这样表示。

二是对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进行了再次强调。建设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深化“证照分离”改革,便利市场主体和产品准入。同时,要强化执法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链条保护,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三是对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进行了明确部署。“中央近来多次提及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强调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表明了加强规制,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决心。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加速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健全数字规则,强化对互联网行业中各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推动互联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马正其表示。

阎峰:2021年中国引擎将引领全球增长

本报记者 李元丽

新发展格局的布局之年,畅通国内大循环、提振消费、加大投资将成为扩大内需和稳定增长的工作重点,而加大开放、加快改革、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将成为经济持续成长的重要保证,并通过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带动全球经济恢复增长。尽管中国需管理好通胀回升的风险以及结构性调整引发部分企业的信用风险,但预期2021年中国GDP增长可达8%,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经济增长引擎。

阎峰进一步表示,在中美关系稳定性增强的预期下,在中国疫情控制远较欧美理想而率先走出疫情危机、经济增长确定性增强、企业盈利增长趋势乐观、内需恢复增长潜力较大的预期下,国际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经济成长而加码投资中国,百万亿元GDP时代的内地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有望在企业盈利增长、估值修复、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三重利好下进一步上开通道,而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供给侧改革将带来增长红利并推动股市繁荣。“我们研判,2021年将是中国实现较快增长、带动全球走出疫情羁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关键一年。”阎峰表示。

葛华勇:2021年扩大消费是稳增长关键

本报记者 李元丽

“2020年消费增速前低后高,逐步企稳。从银联网络交易的数据来看,2020年1-4月份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消费规模下滑较严重,但随着疫情逐步被控制、复工复产有序展开,全国消费规模迅速提升,至2020年6月基本接近上年同期水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联原董事长葛华勇表示。在葛华勇看来,从消费结构来说,综合零售行业整体复苏情况较好,率先在6月恢复至疫情前的消费水平,全年交易金额在全行业中占比提升0.8%。单笔消费强度有所增加,其中百货商品类较2019年增长25%左右。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的消费金额在9月后逐步回落,反映出疫情逐步稳定、居民日常生活进入常态化。餐饮行业2020年上半年单笔消费强度较2019年增长25%,下半年消费强度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充分反映了食品类物价逐步平稳。体育用品行业单笔消费强度较2019年同比增长10%左右,全年交易金额在全行业中占比提升0.5%,说明受疫情影响人们更多地选择自购体育用品居家锻炼。汽车、休闲娱乐、住宿等行业仍未恢复至疫情前交易规模,交易金额仅恢复至疫情前的85%左右。

面向2021年,葛华勇表示,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将迈出建设“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第一步。扩内需、促消费政策将持续持续发力,消费市场稳定恢复的基础将更加牢固,我国国内消费有基础也有条件延续稳健复苏态势,实现消费支撑经济发展甚至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下阶段,扩大消费仍是稳增长的关键。面向大众、年轻世代、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个性化、多样化的细分市场消费需求将更加旺盛,旅游、文娱、医疗、教育等发展型服务消费将步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和收入情况影响消费走势,提升就业质量、保障居民收入、完善消费政策、改进消费环境也仍然很关键。”葛华勇最后说。